

doi:10.3963/j.issn.1672-8742.2015.05.006

## 转与不转——地方本科院校的新抉择

董云川, 邓 凡

(云南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主持人: 董云川, 云南大学教授, 教育学博士。

嘉 宾: 胡仲勋,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王海莹, 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教育学博士。

何 毅, 温州大学副研究员, 教育学博士。

王硕旺,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教育学博士。

邓 凡, 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管理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 G649.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742(2015)05-0040-10

2014年5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相继颁布,在教育部推动和引导下,地方本科院校启动了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的步伐,新的政策导向再次成为学界和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同质化办学”和“就业困难”的现实情况下,地方本科院校在“转与不转”的问题上似乎并无异议,因为发展瓶颈与办学困境逐步显现。转型迟早成为必然,然而“谁该转?”“怎么转?”“转向什么?”等更多的问题却困扰着地方院校。由于传统办学理念的限制,中国地方本科院校基本都将自己定位为学术型、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或教学研究型高校,并且在实际的办学过程中也竞相追逐研究型高校的发展目标,加入千校一面的同质化潮流,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矛盾比较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截止2013年底,中国有普通本科高校879所,“211工程”大学112所(包括39所“985工程”高校),地方本科高校767所。在地方本科高校群体中又分为1999年以来新建的本科高校646所,1999年以前建立的普通本科高校131所。超过一半的地方本科院校要转型发展,确实是一件声势浩大的工程,到底是“安于定位”还是“适时转向”亦或“随机应变”?困惑有增无减。针对一系列困惑,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给出了左右逢源的指导意见:“转型学校可以是新建学校,也可以是历史悠久的学校;可以是学校里绝大部分专业都转型,也可以是一部分专业转型。对于独立学院,如果它们是独立设置的高等学校,鼓励它们定位为应用技术类型的高等学校。对于2000年以后新设的高等学校,鼓励它们转型为应用技术型学校。”然而这一回答并未触及转型的根本障碍,问题依旧悬而未决。

适者生存吗?任何一次社会变革或政策转型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响应者,总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有的“借机下蛋”、有的顺势而为、有的逆流而上、也有的逐浪淘沙被清洗出局。在本轮次的地方本科院校转型改革中,谁愿意成为“小白鼠”,谁会驻足观望,谁会独辟蹊径?只有一点是明确的:谁都不希望被“淘汰”(被时代淘汰或被政策淘汰其实是两回事),然而前方却并没有所谓的成功典范。因此,中国语境中的“高校转型”问题还需要研磨辨析,其间,政府角色如何?学校主体怎样?他国经验是否适切?社会体系是否支持?如何“有为”与“不为”?为此,本期特邀几位青年学者参与“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笔谈,通过对转型困惑与迷茫的讨论,试图为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提供借鉴和思考。

### 胡仲勋: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矛盾与挑战

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以及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的背景下,地方本科高校的转型发展在2014年被提上日程。这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重大调整和变革,必然对中国高等教育从理念、结构到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院校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为应用技术大学一年来热议纷呈,既有共识,尚存有疑惑。

第一,地方办学与地方经济支持不足的矛盾。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是: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展,毕业生就业问题日益严峻,地方本科高校更为突出。因此,转型发展的主要诉求之一便是解决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现有讨论多将上述问题的解决寄望于产教融合、工学结合,换言之使地方本科高校的办学思路 and 方向、教学模式与方法与当地产业对接,突出地方特色,面向地方办学。地方本科高校主要建在地市州这一级行政区划内,而州市级政府对这些高校的财政支持力度则相对有限,在此情况下当地政府对地方本科高校的政策影响力和发展引导性令人存疑。另外,无论是省域还是就全国而言,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颇不均衡,甚至差距悬殊。在一些较为落后的地区,地方本科高校很难找到可以对接的产业,因此,所谓面向地方办学便成为一句空话。所以,面向地方办学不能搞一刀切,应允许地方本科高校基于本校和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有区别有针对性地制定转型战略和规划,在招生、培养和学生就业等环节因地制宜地处理地域性、全国性和行业性之间的关系。

第二,过早专业化与职业教育体系贯通的矛盾。社会和学界对地方本科高校转型还存在一种期望——通过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建立完善的职业教育学历学位体系。具体而言,将职业教育由一种教育层次转变为一种教育类型,构建从中职、高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专业职业人才成长阶梯和上升通道,逐步建立起“与普通高等教育并行且相互沟通、办学主体多样、学历层次齐全、办学功能完备,以市场为办学导向,以应用为根本特点的开放式、高水平的高职教育办学体系。”长期以来,高职教育在中国一直被视为一种较低层次而非特殊类型的教育而居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底层,社会认可度和生源吸引力都很低,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体系

和高职院校的改革发展。将高职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类型来予以体系设计和规划建设,不仅有助于提升职业教育的地位和社会认可度,扭转职业教育在我国长期被矮化和污名化的现实情况,而且有利于形成独立的职业教育体系和人才流通回路。然而,职业教育的特殊性又使上述愿景面临矛盾,职业教育过早过度专业化与职业教育体系贯通间既存张力也相互抵牾。基于学术型高等教育体系的经验,从本科到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教育对学生知识结构和专业素养的要求是一个渐次收窄的金字塔结构,本科教育作为塔基必须广博厚实,这样才能为之后的研究生教育夯实基础。与此相反,高职教育从一开始便是非常窄化的专业教育,这种过早过度的专业化必然对学生的后续深造带来障碍,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成为贯通职业教育体系的内在矛盾和现实挑战。

第三,突出就业导向与坚守教育属性的矛盾。地方本科高校转型的重要内容是将过去一概地坚持学术性本科教育转向突出职业性和专业性,即通过“立足地方、面向行业、依托企业、服务区域”化解毕业生就业困局,具有鲜明的问题解决导向性。然而,历史经验启示我们,这种颠覆性或说断裂性的改革若处理不当往往会矫枉过正,即由于在全社会形成改革共识并赋予改革合法性的需要而将先前实践中的合理成分也不加分析地否弃掉。此次地方本科高校转型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重大变革便在多个方面存在上述隐忧,尤其是因过于强调就业功能而使此类高校本就被式微的教育属性再遭削弱。不论何种类型的高等教育,首先必须承认其教育属性,坚守育人宗旨,这是高等教育的生命之基和功能之源,而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学生就业只有建立在这一基础上才会根基牢固,才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福祉而非带来混乱和灾祸。中国正走在加速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这包括制度、技术和文化的现代化,而这些均依赖于并取决于人的现代化。地方本科高校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主体构成部分,由其培养的人才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质与量。而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多元化趋势,社会建设面临的压力日渐凸显,这就不仅需要国民具备熟练的技术技能,更需要人的现代意识、价值和情怀,尤其是现代公民意识和社会参与能力。因此,转型后的地方本科高校突出就业功能或无可非议甚可说是无奈之举,但若放弃其育人为先的教育属性则难免走入误区,对此必须警醒。

董云川:胡博士所分析的三对矛盾很有价值,无论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度,还是过早的所谓“专门化教育”以及强调就业导向对于教育属性之牵引,都不是简单的宏观政策所能够顾及到的问题。因此,当一项听起来天衣无缝的宏观政策出台之后,本来各不相同的高等学校作为教育的主体,如何反应,又如何应对就成为了真正的问题。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很大程度上是由其面临的整体性发展困局激发和推动的,而转型的动作却是不折不扣的个体行为,于是,转型的过程中当尽力避免因政策导向和教育理念的偏差引发新的发展问题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

### 王海莹:地方高校转型的方向发展

转型初期,顶层设计以及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值得进一步检讨。

首先,转型定位为“应用技术大学”是否妥当?地方高校的转型定位需要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国际地方高校发展潮流。地方高校转型源起于地方高校学生

“就业难”和企业“用工荒”之间的矛盾现象,以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学生实践能力差、缺乏必须的技术培训,因而强调转型方向定位于“技术”,目前通常的说法是“地方高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过渡,认为这样才能契合中国经济社会升级的需求。但是,高校既有服务于经济社会之功能,又有育人之功能。洪堡“由科学而达至修养”深刻地阐释了高等教育的本质,同时揭示出两者之间的关系。高等教育从事的是科学活动,其根本目标在于培养学生道德修养,乃至引领整个民族的精神。但大多数人并不具备探索科学的条件,只是在高校受到科学精神的陶冶,获取应用科学的知识。德国这类大学的德文是“Fachhochschule”,简称“FH”或者“FHS”,所对应的英文是“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那么,翻译成中文应该是“应用科学大学”,并不是当前我们称之为的“应用技术大学”,这类大学专门从事专题性的研究。由于博洛尼亚进程,应用型高校和传统的综合性大学学生均授予同等学术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但是,应用型高校只有和传统综合性大学合作,方能授予博士学位。前者 and 传统综合性大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应用型大学的教师须有三年或者三年以上大学之外的工作经历。应用型大学虽然侧重于技能的教学,但科学素养的培养亦被强调。因此,地方高校仅仅转型定位于“应用技术大学”,则过于狭隘,即使技术型人才也应培养其科学素养、科学态度,强调科学文化素质的根基作用。否则,地方高校的未来方向仅仅是为社会“制器”而非“育人”。因此,地方高校转型定位为“应用科学大学”更能契合高等教育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

其次,职业、就业能否成为高校转型的主旋律?通过转型以调节大学生的结构性失业矛盾,缓解“用工荒”和“就业难”可谓是这次转型的政策目标之一。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以就业为导向”、“以职业为发展”成为部分地方高校转型的主旋律,有的学校甚至是把“以就业为导向”作为转型理念。“就业”和“职业”理念的倡导和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大学生就业矛盾,也会契合学生、家长及企业等相关利益者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则会助长社会功利主义倾向,曲解本来涵义,破坏应用型高校的完整性和基础性,导致地方高校教育性的失衡,甚至于完全用“职业教育”来代替地方高校转型。地方高校的育人功能被窄化,培养学生科学素养及技能全面素质教育退化为技能或者技术培训,地方高校教育活动沦为技能培训活动。“以就业、职业”为主旋律的转型使地方高校越来越远离社会所赋予的育“人”功能。

地方高校转型不能视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权宜之计,也不应视作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和“用工荒”的功利之策。所以,应坚持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在大格局的框架内进行设计,把地方高校转型与科学素养的培养结合起来,把“就业”与“全人培养”结合起来,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与中华民族的未来结合起来。唯有格局放大,方向才能正。二是应面向全球化的挑战,把高校转型与改变国家产业链中的创新结合起来,不能仅限于培养“熟练的操作工”,而应造就既能动手,又具备科学素养,既掌握生产技能,又能够在实践中创新的国际型应用人才。三是地方高校转型应与地方经济升级结合起来,高校率先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此举并不意味着只是升格,而是真正内涵的升级,要依据当地的实际需求和自身的实际情况自主地探索办学模式,在培养

方向、对象、年限与专业方面进行深入探索,成为跨越科学与技术、产业与教育、企业与学校、实践与创造的应用型的高等教育类型。

董云川:王海莹博士强调了转型概念问题。其实,在中国教育改革的语境之中,无论称之为“应用技术大学”还是“应用科学大学”都无关紧要,问题并不在于高等教育事业本身的发展逻辑,而在于领导更能够接受哪一个概念。有时候事情的确不是青年学者能够想象得到的。至于“就业”亦或“职业”,在某种程度上,犹如“待业”还是“失业”一样具有中国式解析范式,绕来绕去,大家忽然发现了常识性的问题:到底,工科专业是不是职业?医学是不是职业?经济类专业是不是职业?师范教育是不是职业教育?培养所谓全面发展的人才之余,是不是还应该以他们的就业状况或者赚钱多少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标准?一团乱麻,看来值得深究下去。

### 何毅:“学术-市场-政府”权力模式变革视角下的转型

“市场正成为第一个真正的世界宗教”。在激烈的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态势下,传统的以知识的价值本身作为评判标准的高等教育学术化生存,正在被以知识的应用为表现形态的市场化生存所取代。市场化生存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高等教育的一种普遍化的生存状态,并将使“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赢者通吃”的场域规则变得理所当然。

高等教育的市场化生存和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具有密切联系。长期以来,中国的高校作为“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封闭运行的惯性和规避风险的趋利性决定了高校的“自身革命”进展缓慢。现在国家提出“部分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无疑在“学术-市场”之间注入了第三股力量,从而形成了“学术-市场-政府”的三角权力模式。在转型过程中,厘清三者的权力边界关系到三角关系的平衡,对正处于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高等教育系统而言至关重要。

首先,转型过程中政府的“有为”与“不为”。地方高校转型的动力从根本上讲不是来自政府部门而是来自高校自身。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对政府部门提出的转型目标给予鼓励,另一方面也应对政府的权力之手保持必要警惕。作为政府代言人的教育行政部门要处理好“有为”与“不为”的关系。

从“有为”的角度看,一是发挥政策的指导性作用。在向应用型高校转型的过程中,要通过政策导向真正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二是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地方高校的转型成本高、风险大。如果政府不能在学科建设、专业设置、师资聘任等方面进行有效的资源分配和资金投入,高校转型的动力就不可持续。三是发挥考核评估的导向性作用。考核评价体系是指挥棒。为了争取更多的经费、资源,大多数高校不得不遵循现有的“游戏规则”,进入大一统的考评体系。为适应转型,地方高校亟需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人才培养专业认证、学科建设标准评估等方面另立指标体系,通过分类评估引导地方高校差异化竞争和特色化发展。四是发挥制度法规的保障性作用。地方高校转型涉及到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社会第三方组织、高中以及学生家长等众多利益主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国家层面的立法予以保障。瑞士、英国和德国等应用技术大学发展比较好的国家,都曾专门出台了相应的法律为高校转型发展提供支持。

相对“有为”，“不为”主要体现为要实现简政放权，把能够交给高校的事情还给高校，能够交由市场的事情交给市场。特别是在事关高校发展的专业设置权、教师聘任权、招生考试权等方面要果断下放，增强地方高校适应市场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给高校的转型发展更多的试错机会和探索空间。

其次，转型过程中市场的“进入”与“退出”。市场是隐形的存在。在高等教育市场化生存过程中，高校办学深受市场影响并要遵守市场规则。在地方高校转型过程中，把握好市场与高校的“进退关系”尤为关键。

从“进入”的角度看，应该逐步打破市场进入高校系统的门槛。企业应积极参与高校的人才培养、专业设置、课程开发、校企合作、就业支持和教学质量评估等工作。高校应在尊重教育规律的基础上主动借鉴企业经营的科学理念，建立适应大学发展的资源拓展机制、科学决策机制、成本核算机制和绩效评估机制。政府要为企业参与高校的人才培养提供更多的利益优惠和政策倾斜，形成高校与市场紧密对接的利益共同体。

从“退出”的角度看，市场应遵循高校的办学规律。高校的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市场应注意抛弃短期的功利意识，避免简单地以“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和“急功近利”的心态来构建与高校的关系，要尊重高校的办学规律，尊重知识的原创价值。

再次，转型过程中学术的“坚守”与“妥协”。地方高校在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过程中，要想在高等教育生态丛林中拥有“一席之地”，必须导入市场经济的竞争、效益和质量等原则，用“市场的口碑”赢得“办学的丰碑”。但是，适应市场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学术的尊严而实行彻底的“市场化改良”，地方高校要寻求学术“坚守”与“妥协”之间的平衡。

“坚守”不是走传统本科教育的老路。在一定意义上是要保护高校作为学术殿堂的纯洁，保护最后一块精神领地不被社会世俗所同化，不变成单纯满足市场所需的职业训练所。这是大学的使命，也是中世纪以来大学能够传承至今的秘诀之一。正如纽曼和弗莱克斯纳所言：大学应该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不是做社会的温度计，对社会的每一个流行风尚都做出回应。大学应不时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

“妥协”不是要放弃学术和学者的尊严。现代大学是一个多元化机构，已经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特别是学术资本主义入侵高等教育领地之后，高校的知识创新和传授日益与商业价值紧密相联。面对知识与市场的“联姻”，走传统本科教育的老路对地方高校是条绝路。地方高校应该主动适应社会，对接市场，在将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存在价值。

转型发展既包括办学层次的转型也包括办学形态的转型。地方高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高等教育的“高等性”和“专业性”没有消失，办学层次和“类”的属性亦没有改变。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地方高校唯有坚守“应用性”和“地方性”的定位，转型发展之路才不会走偏！

董云川：在高等教育市场化生存的背景下，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权力边界值得深思。

何毅博士没有局限于对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具体问题的分析,而是借用伯顿·克拉克经典的三角权力模型,从“学术-市场-政府”三者权力博弈的视角论述了转型过程中政府的“有为”与“不为”、市场的“进入”与“退出”、学术的“坚守”与“妥协”等基本关系,致力于厘清转型过程中如何把握好学术、市场、政府各自权力的边界,为我们思考地方本科高校转型提出了较为宏观的理论指导和较为有效的分析框架,其理性的辨析颇有参考价值。

### 王硕旺: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应避免陷入认识误区

误区一:转型发展是教育部推动的行政项目。显然,教育行政部门是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主要倡导者。尽管如此,转型发展的根本动力其实来自于市场,教育行政部门的政策推动只是弥补市场失灵的辅助性手段。地方本科高校只有面向市场主动转型,努力实现学校办学与地方经济发展对接;专业设置与地方主导产业对接;人才培养目标与行业需求对接;人才培养规格与工作岗位要求对接,才能够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如果将转型发展理解为被动执行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命令,忽视甚至无视市场对高等学校转型发展的迫切需要,转型发展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无法取得预期的成效。

误区二:转型办职业教育是学校发展的倒退。很多高校管理者认为经过多年努力,学校好不容易才从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升格成本科层次的高等教育,再转回头去办职业教育是学校发展的倒退。高等教育对应的是初等和中等教育,表征的是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职业教育对应的是普通教育,表征的是高等教育的类型结构。二者的交集是高等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建立学术型与职业型高等教育并举的“二元制”高等教育结构体系,搭建普通学术型与应用技术型相互衔接、相互融通的高等教育“立交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学习者个体全面发展的多元化需求。这是现代高等教育结构体系建设的普遍经验。因此,从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方向来看,不仅要大力发展本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而且还要积极发展研究生层次的专业教育。因此,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不仅不是历史的倒退,而且还有可能在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方面占得先机。

误区三: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就是要办工科。有些地方本科高校的管理者认为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就是要把学校办成工科大学,这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来建设实验室和实习、实训基地,学校不具备这样的办学基础和投入能力,原有专业结构调整和师资队伍分流的压力太大,学校所在区域的产业结构对工科人才的吸纳能力也有限,因此缺乏主动转型的意愿。但事实上,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并不等于盲目发展工科,而是要在原有学科结构基础上,调整办学思路,整合教育资源,提升教育效能。例如,由原来地市级师范专科学校基础上升格而成的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方向不是完全抛弃教师教育的基础和优势,而是要从培养学术导向型教师转向培养技能型教师。根据教育教学实践对教师知识结构、技能结构、职业精神和团队意识等方面的要求重新设计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更能够胜任教学工作的教师。

误区四:转型就是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培养产业工人。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确实会增加大量的实践教学内容,但这并不等同于简单的职业技能培训。应用技术大

学的人才培养模式虽然面向市场,但并不忽视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人才培养规格上,既注重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又注重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同时,还通过多种渠道提升学生的团队精神,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教育内容远远超出职业培训的范畴。应用技术大学不仅要培养高级产业工人,而且要培养各行各业的高级工程师、技术研发人员、技术骨干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不仅要培养普通从业者,而且要培养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领军人才;不仅要提供职业教育,而且要提供形式多样的创业教育;不仅要主动适应社会发展,而且要积极引领社会发展。

误区五:地方本科高校只能面向所在区域办学。有关研究认为,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就是要面向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调整专业结构,培养所在区域紧缺的各类人才。这种认识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面。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确实需要树立面向所在区域,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理念,努力实现学校办学与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对接;专业设置与地方主导产业对接。但同时,地方本科高校必须突破区域的局限,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与行业需求对接;人才培养规格与工作岗位要求对接。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的质量诉求应当是追踪科技前沿、促进科技进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充分利用科技发展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知识和科技无国界,地方本科高校不仅要突破区域的局限,而且还需要突破国家的边界,通过国际合作办学,提升教育质量。

在中国,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已经进入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深水区”,潜在的风险难以预见,也缺乏成熟的经验可供参照。因此,存在上述认识上的误区在所难免。通过相应的理论研究、比较分析和实践探索,各种认识必将逐步得以厘清。

董云川: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推动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无疑应当对转型发展的动因、内容、方向等基本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王博士所梳理的五大认识误区,从主动的角度看,是为政府决策提供了理论的支撑依据,从被动的角度看,似乎在为高校的作为方式寻找理由,而从逻辑的角度看,似乎进入了“既是这样”、“又是那样”的圈套之中,表述很正确,说理很充分,论证很有道理,但是——这与正常的地方高校发展路径又有何区别呢?转不转不都一样嘛!

## 邓 凡:欧洲发达国家应用技术大学的经验与启示

转型发展坚定地拉开了帷幕,但由于自身的办学条件和办学观念等现实条件的限制,困难与挑战在所难免。在欧洲,许多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创办应用技术大学,至今已有40多年的办学历史。比如,在德国共有247所应用技术大学,比普通大学多出97所,每所学校在校生规模约为4000人,应用技术大学成为德国高校体系中一个自成一体的支柱。在荷兰,20世纪80年代应用技术大学多达350多所,后来经过重组与合并至今也有43所公立应用科技大学。据统计,“荷兰有10%左右的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13%左右的大学预备教育毕业生、约80%的普通中等教育毕业生进入应用科技大学学习,也有10%的学生从研究型大学毕业后进入应用科技大学学习”。德国、荷兰等这些欧洲发达国家应用技术大学都因办学特色鲜明、为区域经济发展、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注入新的活力而享誉世界。毫无疑问,德



国、荷兰等这些欧洲发达国家的应用技术大学办学经验,对中国地方本科院校转型无疑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第一,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需要历史传承与现代的结合。转型,并不意味着“割裂”。欧洲发达国家每所应用技术大学的建立背后都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每所应用技术大学的现代化发展都能找到城市发展的痕迹,具有鲜明的发展特征。城市的历史、文化传承与应用技术大学的精神、现代科技发展、教育理念融为一体,形成了各自鲜明的风格。如德国的不莱梅应用技术大学,它充分利用不莱梅这个小的港口城市特色和近邻空中客车生产基地的优势,大力发展航空科技、船舶制造、航海技术等特色专业,增强了自身的科研实力与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中国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中要利用各地方的特色优势来发展自己的专长,形成自己的个性。

第二,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要有法律制度和经费制度的保障。欧洲发达国家的应用技术大学迅速发展的根本动力,除了产业界对提升工程技术人员培养层次的高昂呼声之外,另一个最大的原因在于国家立法和经济的支持。比如德国,由于其自然资源的短缺,德国经济高速发展只有依赖知识的进步和技术的创新,工程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对德国经济发展尤为重要。在 20 世纪 60 年代,德国产业界对高技术人才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但德国的高校与工程师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还未得到国际性的认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1968 年德国各州通过了《联邦共和国各州统一高等学校协定》,将以前的工程师学校及经济类、社会教育类、社会工作类、设计类与农业类的高等专业学校合并建立应用技术大学,并在随后几年对重组后的应用技术大学提出了扩建及结构改革等建议。在荷兰,早在 1919 年应用技术大学就获得了《国内科学与科技教育法案》(*Domestic Science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Act*)的支持;在 1993 年荷兰《高等教育和研究法》(*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ct*)中,进一步明确了应用技术大学的法律地位,规定了荷兰应用技术大学的目的是为特定职业提供理论教学及实践技能。此外,德国、荷兰的应用技术大学能快速发展离不开物质的保障即经济的支持。比如荷兰,应用技术大学的经费来源包括政府拨款、合同收入和学生学费等,其中政府拨款多达 70%。仅 2010 年,荷兰教育、文化和科学部为应用技术大学提供了 23.86 亿欧元,学生学费提供了 6.37 亿欧元,合同收入提供了 4.28 亿欧元。可见,欧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应用技术大学的产生,而立法和经济保障则使应用技术大学更加繁荣昌盛,中国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中,国家仍然需要在这两方面努力,来保障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顺利实现。

第三,地方本科院校自身要明确人才培养目标、重视师资队伍水平、注重校企深度合作。一直以来,中国地方本科院校在人才培养方面与应用技术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差异明显,地方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倾向于科研型而非应用型。纵观欧洲发达国家的应用技术大学,他们的人才培养目标非常明确,比如德国的应用技术大学,“企业需要什么,学校就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他们强调面向应用、面向实际、面向未来,培养掌握科学的方法、擅长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工程、技术专门人才。德国的应用技术大学的师资队伍水平相对较高,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高等学校总

法》规定应用技术大学的教授的聘任条件是:拥有大学学历,5 年以上工作经历,其中至少在相应专业岗位上工作 3 年,有 2 年以上的教学或培训经历。中国地方本科院校在教师招聘时没有明确的相应的实践经历要求,只有学历要求,这与真正意义上的应用技术大学的师资水平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校企深度合作更是我国地方本科院校办学过程中的短板,缺乏与企业合作的经验。而欧洲发达国家的每所应用技术大学都非常注重校企合作,比如在荷兰,每所应用技术大学都获得了法律和政府的资金支持他们开展校企合作。为了促进校企合作,荷兰政府特别设立了国家职业培训和劳动力市场专业技能中心,为学校寻找学生的实习场所,国家根据这些机构或中心的工作效果给予拨款。另外,荷兰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法》还规定:招募一大批公司提供实习培训场所,并监督这些公司的质量,为校企合作提供相关的保障。在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中,国家要创造相关的环境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创造条件,地方本科院校自身也要转变观念,积极寻求校企合作的机会,明晰人才培养目标,提高师资队伍的理论与实践水平,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董云川:在没有成功“转型”先例的情况下,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探索需要去借鉴相关的经验,因为我们总是希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思考”。但谁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那个肩膀呢?欧美发达国家的二元制教育也好,还是邓博士介绍的德国、荷兰等国家应用技术大学的办学经验和特色也好,教育行政领导们早就参观学习过了,许多高校也交叉友好过很长时间了,结果学到了什么呢?如果不从根子上还原高等学校自主发展的能力,创设相应的自组织生长环境,忽左忽右的政策引领既可能为地方院校的发展带来生命力,也可能成为原有发展规划的腰斩梦魇。所以,邓博士提供的经验也仅仅是一种借鉴,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才是正途,群起而“复制”的转型局面其实好可怕。

说转就转吗?转了再说吗?还是边转边说?究其实,转与不转,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表面上是个政策导向问题,本质上还是个资源配置的游戏,在高等教育的发展逻辑上毫无悬念,而在高等学校自身的生存境遇上依旧迷雾重重!

(收稿日期:2015-08-01;编辑:伊 夫)